

《世说新语》研究

导师：霍松林 撰者：范子烨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浩浩洪流中，《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是一部出类拔萃的杰作。它饮誉今古，蜚声海外，目前已成为一个国际性很强的研究课题。本文即是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成的。

一

由于晋宋时代的文献资料所存无多，因而《世说》的许多基本问题至今仍然使研究者深感困惑，如它的作者、成书时间与过程、名称及材料来源等等。探讨这些问题的首要途径在于以作品本身为基本出发点，同时参证正史的有关记载。而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一）《世说》成于众手说

《世说》之作者，历代的官、私书目皆题为临川王刘义庆，南梁刘孝标亦持此说。《宋书》卷51《刘义庆传》载：“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

传文所记袁、鲍、何、陆四人乃义庆幕府中的知名文士。明

人陆师道与清人毛际可以为他们对《世说》的编撰有“赞润”之功（王昶《今世说·评林》），即潜在地认为《世说》是集体合作的结晶。本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及其前后》中，对陆、毛之说加以发挥，称《世说》“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此说一出，即广为学术界所接受，几成定论。但鲁迅所说，实为推测之词，并非经过翔实、细密的考证而得出的科学结论，70年来亦无人能够证明这一观点。鲁迅的推测是符合实际的，并且极富学术价值。

从作品本身看，《世说》“成于众手”的痕迹表现在三方面：语言风格不统一；条目归类不尽妥当，时有混乱；记载同一言行，异说兼存，并多重重复、矛盾之处。本文认为，《世说》之编撰者必然具有与此书相近的文章水准和遣词用语习惯，《世说》在他们的诗文创作和日常言行中亦应留下或隐或显的印迹。由此出发，我们便可以发现：刘义庆的大部分著作皆系他人捉刀的产物，他现存的作品也没有一丝与《世说》相关的痕迹，其文章水平与《世说》也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编撰《世说》的过程中，刘义庆只是充当主编，而非具体的执笔人。

《世说》的实际编撰者就是刘义庆幕下的那四位知名文士。袁淑的文风、性格与《世说》及书中的人物颇多近似之处，平时的言论也常与《世说》的语言和故事有关。他在当时文坛地位甚高，因而成为《世说》的主要执笔人之一。鲍照不仅在文风上与《世说》有相似之点，而且经常运用与《世说》相同的语汇和典故，特别是他集中的《数名诗》和《字谜三首》，更具有与《世说》的某些条目十分逼肖的形式特点。鲍照与义庆关系至密，追随他的时间较长，在其幕府文人中又最富有文学才能，因而成为《世说》的又一位重要作者。何长瑜的《嘲府僚诗》与《世说》中的某些“韵语”十分相似，又曾以文学之才为义庆所招至，故当为《世说》作者之一。

六朝人最重氏族所出，这一点对考察《世说》的作者及成书问题也非常重要。刘义庆与琅邪王氏和彭城刘氏，袁淑与琅邪王氏、吴郡顾氏及袁豹，鲍照与琅邪王氏及傅亮，何长瑜与陈郡阳夏谢氏，陆展与吴郡陆氏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刘义庆及其手下的四位文士与《世说》中的某些人物或这些人物的后代还有直接和间接的接触。这充分说明《世说》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四位编撰者耳闻目睹之事实为依据的，并有宣扬门阀、自我标置的用意。

（二）《世说》编撰的具体情况和体例渊源

《世说》的编撰有一基本通例，即不著录在世人物的言行，所谓“以今人述古人”（王说《今语林·自序》），乃是《世说》记言叙事的角度。《世说》中的傅亮和谢灵运是两位自晋入宋的人物，《世说》必成书于他们死后，再考察群贤汇聚在义庆府中的时间，我们可以推断《世说》全书完成于元嘉十六年（439）四月至元嘉十七年（440）十月，前后历时18个月，地点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而刘义庆之所以主编《世说》有三方面原因：因“世路艰难”（见前引《宋书·刘义庆传》）、皇帝多忌而寄情文史，以求全身远祸；刘宋时代讲说魏晋故事的风气的影响；彭城刘氏重视文章学术的家学传统的影响。但此书原名并非《世说新语》，而是《世说》，这一点南梁刘孝标的《世说注》和宋末齐初史敬胤的《世说注》可以证明，其它异称皆为后起之名。

《世说》之“世”字，意谓世间、世上，用以修饰、限定“说”，故“世说”为偏正结构之复合词，“世说”指世间之通说。先秦时代文献典籍名称中的“说”字有三种含义：一为论说、解释，二为辩说、辩论，三为“小说”，即与高言宏旨无关的没有太高价值的琐屑之谈。“世说”之“说”字便囊括了这三种意义。

《世说》依门系事的体例也是渊源有自的。西汉刘向的《说苑》为这种体例的发轫之作，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西晋郭颁的

《魏晋世语》和东晋荀氏的《灵鬼志》都承袭了这一体例，《世说》也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影响。

（三）《世说》正文中窜入的注文和批语

《言语》71、《文学》43、《雅量》42、《识鉴》25、《赏誉》66、《品藻》21、《豪爽》5和8、《任诞》15和19、《简傲》4、《轻诋》13、《尤悔》5、《栖逸》7，凡此各条之末句及《赏誉》34“谓安期”以下，《排调》47“昔羊叔子”以下和同门50、61末句，《假譎》9“玉镜台”以下，皆是注文。《忿狷》7“所谓”以下、《尤悔》14“夫以水性沉柔”以下及《纰漏》5“太傅虚托”以下，皆是批语。

（四）《世说》故事考

1. “竹林七贤”（《任诞》1）

关于“竹林七贤”这一文人集团名称，前人解释多误。“七贤”取义于《论语·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此甚易解。但嵇康、阮籍等“七贤”的诗文没有关于“竹林”的描写，《水经注》等书关于竹林遗迹的记载亦皆出于后人之附会。此事可疑，必有待发之覆。在东晋时代，谢安与名僧交往密切，于不觉之中受到了僧徒以内典与外书相比附的解释佛经的方法——“格义”的影响，乃取天竺文化之“竹林”（竹林精舍，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9《摩揭陀国·迦兰陀竹园》）加于“七贤”之上，遂成“竹林七贤”，并被当时的作家袁宏载入《名士传》中。格义是形式的改铸，比附是内容的粘合，它们是两种异型文化沟通的必由之径。“竹林七贤”故事的产生，既说明了这一点，也显示了传统思想压力的强大。

2. 嵇康锻铁（《简傲》3）

锻铁是嵇康生平事迹中不可忽视之点。它以躲避政治迫害为首要目的，又与服食药物密切相关。嵇康是有神论者，为成神

仙、致不死，他特别注重吃药，其中以五石散最为常见。由这种药物的性质所决定，锻铁成为嵇康的特殊身心调养术。

3. 阮籍之“啸”（《栖逸》1、《简傲》1）

“啸”相当于今日的打口哨，它是晋代士人的一种重要的生活习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潇洒不羁的魏晋风度。阮籍是开启两晋“啸”风的关键性人物。阮籍之“啸”名为“阮氏逸韵”（孙广《啸旨·阮氏逸韵章第十三》），其“啸”法十分特殊，称为“指啸”。

4. 阮籍“青白眼”（《简傲》4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

此事又见于《晋书》卷49《阮籍传》，系后代文人常用的典故之一，“垂青”、“青眼”、“青目”等语汇并源于此。青眼，眼睛正视，眼珠在中间，表示对人尊重或喜爱；白眼，眼睛向上或向旁边看，现出眼白，表示轻视或憎恶。“青”是黑的的意思，“青白眼”实即黑白眼。这并非“特异功能”，而是“口不臧否人物”（《晋书》本传）的阮籍表示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段。由于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首要人物和正始时期的杰出诗人，声名赫赫，如日丽中天，故其“青白眼”的故事为人们所习知乐道。

二

作为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世说》以“语言为宗”（吴瑞征《八卷本手批〈世说新语〉序》），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一）《世说》语言的时代特征

《世说》的问世，使“文章蹊径好尚”为之“一变”（刘熙载《艺概·文概》），引起了中国古代文章语体的一次革命。在晋宋之际，《世说》实现了言文合一，这是对先秦语录体散文的继承和增华，它由此而凝铸成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其不可传译

性和不可模仿性亦缘乎此。《世说》中的俗语包括士族间通行的口语和江东地区的方言，这两种活的语言与典雅的书面语融合无间，使这部作品形成了特殊的语言韵味，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由于“世异语变”、“方言不同”（葛洪《抱朴子》），《世说》作为中古俗语的“活化石”也给后世读者造成了不少阅读方面的障碍。

（二）《世说》的语言特色

由于《世说》直接从生活中撷取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因而形成了自然、质朴、简易的语言风格。但作为一部集体性著作，它的语言风格并非简单划一的。《世说》以抒情议论为主的条目，经常运用比喻、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语言极其华丽。晋人重含蓄，忌直露，《世说》的语言也充分显示了这一审美倾向，如典故和喻词的结合、一语双关的手法和对无言之美的追求等等，皆与此有关。简洁的美是晋人清谈艺术的一种胜境，崇简而避繁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倾向；在这种尚“简”的艺术审美观的作用下，《世说》的语言形成了简洁之美：写景状物洗炼优美，谈事论理简明扼要，并以十分经济的文字揭示深刻的生活哲理。另外，晋代的清谈名士对语言的音节、声韵十分重视，这种风气在《世说》中有十分生动的反映。如音节的整齐、声调的抑扬和句尾的押韵，叠字和对偶句的大量使用等等，都使作品的语言极富音乐美。《世说》的语言还具有浓郁的幽默色彩。在《世说》中，魏晋名流的幽默风趣与呆板拘谨的汉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第25门《排调》堪称幽默语汇的百宝箱。《世说》语言的幽默多与讽刺的寓意相联系，常常表现在使用“韵语”、典故和活用词语三方面。

（三）《世说》语言的用典艺术

《世说》是一部长于用典的志人小说。其用典特征是：频率高，涉及典籍多，这是由魏晋名士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深厚的学问

根柢决定的；自然浑成，融化无迹，即善于把古事、古语融于笔下，将痕迹洗濯殆尽；贴切、准确，恰到好处，“用事而不为事所使”（张炎《词源》）；富于新意，自出机杼，或于典故的原意有所取重、弃舍，从侧面和反面略加逗引，使所要表达的意思更加显豁，或另翻新意，倍见精警；意蕴深厚，具有情外情、味外味，发人深思，引入联想。从每一条的情况看，《世说》的用典方法有：单用，即每条中只用一个典故；连用，即在同一条的不同语句中连续使用典故；叠用，即在同一条的同一句话中，使用两个以上典故，典中有典，典故交叠。从用典隐、显的角度看，《世说》采取的方式有：明用，即直书古事、直引古语；暗用，即以隐蔽的方式用典，不直接标出。从用典寓意与典故原意的关系上看，《世说》的用典方法有：正用，即遵从典故之原意，与目前的情况相比论，以便说明问题；反用，即反其意而用之，以求创新出奇；借用，这一用典方式又表现在三方面：（1）借词，即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借前人典籍里的语言来替换一般常用的字词；（2）借事，即利用人们熟知的史实、故事，用以暗示所要表达的思想；（3）借境，即凭借典故特有的意境，引发联想，使所写之情事受其浸润，而更为优美动人。

三

《世说》是我们饱览魏晋风流的一扇开阔的天窗。它塑造的名士群像，既闪烁着历史人物的壮丽色彩，也跃动着夺人眼目的美的光辉，其“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世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由于汉民族崇尚征实的史官文化的影响，自谢安批评裴启《语林》记言不实开始（《世说·轻诋》24），历史主义便成为文艺批评领域的突出倾向。这说明当时的读者和作者还习惯于从

史的性质来认识和要求摹写人间言动的志人小说，而对小说本身的文学特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世说》所进行的历史主义批评，以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最为剧烈，四库馆臣认为“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史法，拟于不伦，未为通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颇为中肯。而前乎刘知几的史敬胤、刘孝标及明人郎瑛以及近人余嘉锡、刘盼遂等，也都着眼于《世说》中有关史实的真伪，更充分地表现出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真实不同于艺术真实。《世说》不是汉、魏、晋三代历史生活的简单复写，而是对这三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艺术升华，《世说》的文学价值也就在于此。在这一升华的过程中，《世说》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故能“远实用而近娱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当然，由于《世说》处于中国小说的萌芽阶段，只是“粗陈梗概”的“丛残小语”（桓谭《新论》），艺术虚构还不免幼稚。但《世说》横跨历史与文学两大畛域，并且“变史家为说家”（钱曾《读书敏求记》），开后来无数法门，其先导之功实不可没。

（二）《世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特点

《世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准确地把握人物的“传神之形”——眼睛，二是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法。

“人的眼睛、面孔、皮肉乃至整个形状都显现出灵魂和心胸。这里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黑格尔《美学》）因此，《世说》不厌其烦地描写人物的眼睛，将“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同上）。这种描写常常是通过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进行评论的方式来实现的。《世说》塑造人物形象通常采用的艺术手法有三种：一是对比。对比是人物品藻的方式之一，在《世说》中随处可见。从内容性质看，《世说》的对比可分为善与善、善与恶、恶与恶、非善非恶几类。在作者的笔

下，不仅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和事件持有不同的态度，在同样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行动，同一人物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场合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通过对这些复杂情况的描写，对比的艺术效果更加强烈。由于人物品藻的影响，《世说》的对比手法有时又是直接通过某些人物的特定评语实现的。二是细节描写。《世说》分门隶事的体制和短小的篇幅形式，决定它刻画人物必然着重于细节描写。作者选择的细节是生活中最典型的，即最能表现人物精神和性格的细节，富于戏剧性，并带有夸张的色彩。《世说》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细节描写的艺术传统的一块基石。三是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述史方法。它是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个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世说》的互见法与《史记》不同，它不是直接标出，而是暗中使用，即将同一人物的言论、故事按其内容置于不同的门类当中，这是与《世说》的结构和体例特点相一致的。互见法的使用揭示了人物“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恩斯特·卡西尔《人论》），展示了“事物各个方面的不可穷尽性”（同上），使人物形象的刻画避免了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单一化弊端。

（三）《世说》中的妇女形象

在魏晋时代，率真自然、潇洒脱俗的艺术性人生和唯美主义态度构成了士族生活的主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士族妇女通过感情的自然荡漾，努力追求精神的自由，以捍卫其生存空间。

《世说》第19门《贤媛》，便塑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群体。这一群体的主要特点在于：广泛介入社会生活，社交活动异常频繁。如参加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研讨，参与名士之辩难、问对和品评人物、月旦人伦的活动；登楼观览，遨游道路；听音赏乐，富于审美情韵等等。追求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幸福、自由的婚姻、爱情。她们“先时而婚，任情而动”（干宝《晋纪总论》），

冲破了礼教的束缚，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男子的平等的尊重；她们可以自由抒发对丈夫的情和爱，出于伟大的母爱，甚至敢于唐突社会名流。既有传统的美德，也具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性格：勤劳耐苦，善于持家；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头脑睿智，见识不凡；心胸坦荡，不畏生死。《世说》不仅揭示了士族女性的光辉，也表现了其中某些人物道德上的败坏，如招权纳货，贪脏枉法，唯钱是务，干预人事等等。由于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有的女性为了家族利益而牺牲了个人幸福，甚至自卑自贱，自为戒律，束缚自我。凡此均显示了她们的历史局限。这些描写使《世说》人物画廊中的女性形象更趋真实、丰满。

（四）《世说》中的少儿形象

少年儿童的形象为《世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股活泼、清新的气息，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其主要特点是：聪明、机警，富有智慧，善于辞令；深明礼义，通晓事理，见识不凡；心地善良，天真可爱，富有正义感；自尊自重，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乐于思考，具有探新求知的精神；视野开阔，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些少儿人物都是士族子弟，他们的活跃，体现了世家大族对未来的希冀；另外，中古时代早慧的人才观念对《世说》少儿群像的生成也有重要的影响。早慧，表现在“才”、“学”、“识”、“德”、“神”、“言”、“志”等七个方面。凡此在《世说》的少儿人物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

《世说》是魏晋时代风俗画的长卷。它描写了许多中古士族的特有习俗，特别是名士清谈、人物品藻和嘲戏之风，对中国文化和文人思想影响最大。

（一）名士清谈

《世说》是“清谈名士的教科书”（鲁迅《病后杂谈》），

它以浓墨重笔描绘了魏晋士林的清谈风尚。

“清谈”一词最早见于汉末建安时期之文献，即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诗》和曹丕的《又报钟繇书》。清谈思想源于汉代之道家方术，《易》、《老》思想和儒学思想，形成于汉末，树立宗风于曹魏正始时期。清谈的思维方式发源于东汉之清议，从作为《世说》重心的十四门各自的起始人物可以看出，东汉安、顺二帝时期的某些士人已为魏晋清谈导夫先路。“清谈”又写作“清谭”，“谈”、“谭”相通。“清谈”包含四种意义，即美谈、雅谈、正论和以“三玄”（《庄子》、《老子》、《周易》）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辩论活动。在最末一项意义上，“清谈”有多种同义语，见于《世说》者，有“清言”、“咏”、“言咏”、“谈咏”、“理咏”、“言理”、“谈理义”、“言玄理”、“谈议”、“谈道”、“谈话”、“谈玄”、“谈”、“清论”、“微言”等等，其中的“清言”最为常见。在正论的意义上，“清谈”与“清议”又是相通的。以玄学研讨为内容的清谈有两种方式，即“笔谈”和“口谈”。“笔谈”即写文章，以自述和答难为主要方法。“口谈”即口上之谈，以问答、辩难为基本方法，多在两人之间进行，偶而有一个配角参加。发难者为“主”，辩答者为“客”，主客地位时有变化，也有“自为主客”者。“口谈”有“番”数，这相当于武人交手之回合。《世说》描述“口谈”的过程，常用一个“通”字，意指：解释、阐述；解释得清楚、明白；通晓、理解。“口谈”的处所，或在公座，或在私座，或在非公非私的大自然中。

中古清谈可分为四期：萌芽时期，由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到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形成时期，由魏齐王正始元年（240）至十年（249）；③发展、鼎盛时期，由魏齐王嘉平二年（250）至东晋恭帝元熙元年（419）；衰落时期，由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

（二）人物品藻

人物品藻与名士清谈有密切的关系，《世说》第8门《赏誉》和第9门《品藻》集中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但人物品藻是一种独立的士人习俗，也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传统之一。

关于品第、品位的区分最初见于《尚书·禹贡》，用以考察当时全国的田土质量和田赋数量，其排列顺序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对此加以改造，率先将它移用于人物品评上，创造了“九品”论人的基本模式。此后，人物品藻日趋成熟，不仅有等级的鉴别，还有详确的评语。

人物品藻的方式主要有：（1）名号称谓与事数标榜。名号称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从多角度反映了当时士人的个性特点；事数标榜，如“竹林七贤”，“竹林”为事，“七”为数，“贤”为标榜之义。事数标榜代表了社会公众的意见，体现士林对某些人物的共同评价与看法。这两种品藻方式实际上是对某一人物或某一人物集团的主要特征的抽象和概括。（2）歌谣谚语。即以押韵的语句描述、评论人物，生动、形象，流传广泛，其具体形式主要有“为之语”、“为之歌”、“为之谣”、“为之谚”、“歌之”、“称之”、“语曰”等等。此类歌谣最早出现于东汉，以七言为主，间有四言和五言者。（3）文章著作。东汉名士郭林宗曾著有品评人物的专著，后来亡佚，应劭的《状人纪》和《中汉辑序》亦属此类著作；三国时期，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杨戏的《季汉辅臣赞》，皆以评论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晋代这类著作较重要的有十九种，南朝有四种，其中以《世说》最为突出。从具体内容上看，人物品藻的方法主要有：直评法，即直截了当地说明对某一人物的意见和看法，不涉及他人；比较法，即将人物互相比较，或以今人比今人，或以古人比今人；在比较的过程中，常常采用“×事，××不如××”和“×事，

××胜过××”的形式。

(三) 嘲戏之风

嘲戏这种习俗萌芽于先秦时代，在秦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亦偶有表现；汉末、三国时期，嘲戏之风潜滋暗长，至两晋而大盛。这在《世说》第2门《言语》和第25门《排调》中有充分反映。

嘲戏是以人为主体的对象而进行的口头嘲讽游戏，其发生与完成皆以人为第一着眼点，而时人之所重，往往即是嘲戏之所关。构成嘲戏的内容包括：父祖之名讳与氏族之由来；身体、形貌、动作、名字、地望；缺点、习惯、爱好、宗教信仰及言谈中的偶然失误。受清谈的影响，嘲戏形成了单方嘲戏，互相嘲戏和自我嘲戏三种方式。

五

《世说》问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海内外之儒雅学子、倜傥骚人，无不仰其隽秀、揖其清芬。

《世说》仿作、续书之多，为古今所罕见。自北齐阳松玠《谈薮》之后，此类作品南朝有3种，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分别有5、4、2、15、14和1种，凡45种。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皆应有一席之地。后世的戏曲家和小说家还经常从《世说》中汲取素材，重新进行艺术加工，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世说》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批点小说。南宋学者刘辰翁是批点《世说》的第一人，他创造的这一评论形式对中国文学批评和小说美学是一个重大贡献。此外，由《世说》而产生的大量成语、典故是汉民族文学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世说》是历代文人士子取典炼意的渊薮之一。

《世说》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最迟在公元

797年，隋唐时代的日本使者便将《世说》携回国内，在文人中广泛流传，成为学习汉语者必备的文学课本。此后，日本学者相继出版了多种翻刻本和日文译本，注释、研究《世说》的著作大量产生，众多的仿作也纷纭而出。《世说》的语言和故事也经常见于日本文学家笔下。目前，举世瞩目的唐抄本及宋版《世说》仍然保存在日本，无怪乎大和民族以研究《世说》而名家的学者层出不穷了。

作者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袁 俐）

《晋书·夏侯湛传》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夏侯湛传》：“富于德，贵于官，其所发明，虽叩牛操筑之客，佣赁拘关之吏，负俗怀讥之士，犹将登为大夫，显为卿尹。”“拘关”不好讲。“拘”应似为“抱”，或因形近致讹。《四部备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皆作“抱”。

抱有持守义。《管子·形势篇》：“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注：“抱，持也。”《老子》：“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河上公注：“抱。守法式也。”《后汉书·朱佑景丹等传论》：“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李贤注：“抱关谓守门者。《前书》曰，萧望之署小苑东门候，王仲翁谓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关为？’”“抱关”，即守关的人。常与击柝、执籥搭配成词。如《孟子·万章下》：“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荀子·荣辱》：“或监门御族，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蔡邕《巴郡太守谢版》：“知纳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闻，乞闻冗抱关执籥，不竟录符银青，授任千里。”皆用以指位卑禄薄的官吏。

• 陈维礼 •